

中国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认知

——以《拉丁美洲研究》为例的学术史梳理

韩琦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梳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自 1979 年从创刊以来发表的关于拉美国际关系的文章，发现该杂志在 2000 年之前，关注的重点是美拉关系，2000 年之后，关注中拉关系的文章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性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力求实事求是地、客观真实地反映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同时，又辩证地探讨和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症结所在，并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是，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追求霸权的目标将最终导致失败，坚持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才是希望所在。

关键词： 《拉丁美洲研究》 美拉关系 中拉关系 中国学者 认知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学术界对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的认知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随着中拉关系的不断发展而逐步深化，到 80 年代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¹，从 90 年代开始，一些系统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²。进入 21 世纪之后，又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³。本文无意对这些著作加以评介，而是试图透过中国唯一的一份研究拉美的专业刊物《拉丁美洲研究》杂志，来探讨一下中国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认知程度。

《拉丁美洲研究》是由作为中国拉美研究最大智库的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期刊，是目前中国唯一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专门研究拉美地区重大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大型学术刊物。它创办于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 1979 年，最初的刊名为《拉丁美洲丛刊》，1985 年改为《拉丁美洲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创刊到 2013 年底，该杂志 35 年来总共出版了 203 期，发表文章 3125 篇。按照学科分类，拉美政治 412 篇（占总数的 13.2%），拉美经济 1033 篇（占总数 33%），拉美社会 340 篇（占 10.9%）。拉美文化 103 篇（占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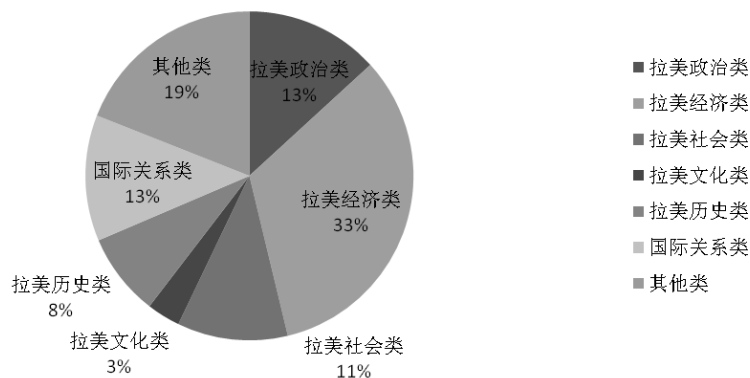
¹ 如沙丁、杨典求等：《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简史》（1986）。

² 如陈芝芸等：《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1991）；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1994）；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1995）；洪育沂主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1996年）；徐宝华、石瑞元：《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1996）；陈芝芸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南北经济一体化的尝试》（1996）；郝名玮等：《外国资本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1998）；德梅德里奥·博埃斯内尔著、殷恒民译：《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1990），等。

³ 如曾昭耀主编：《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2000）；王晓德：《挑战与机遇——美洲贸易自由化研究》（2001）；李明德、宋晓平主编：《一体化：西半球区域经济合作》（2001）；宋晓平主编：《西半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2001）；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与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2001）；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2002）；孙若彦：《经济全球化与墨西哥对外战略的转变》（2004）；王萍：《走向开放的地区主义》（2005）；冯秀文：《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2007）；朱鸿博等主编：《国际新格局下的拉丁美洲研究》（2007）；苏振兴主编：《国际变局中的拉美：形势与对策》（2014），等。

拉美历史 255 篇（占 8.2%），国际关系 388 篇（占 12.4%）⁴，综述、书评、消息等其他文章 594 篇（占 19%）。其中关于拉美国际关系的文章涉及到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拉美地区对外关系、拉美各国对外关系、美拉关系、中拉关系、拉美与欧洲关系、拉美与苏联（俄罗斯）关系、拉美与亚洲关系、拉美与非洲关系、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美洲及拉美地区国际组织及会议等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拉丁美洲研究》中有关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简要归纳与评介，以便从中管窥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认知的演变。

《拉丁美洲研究》发表文章篇数（1979—2013）



一 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美拉关系是拉美国际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在 2000 年之前，《拉丁美洲研究》二分之一以上国际关系的文章都是讨论美拉关系的，这是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对美拉关系的总体判断和历届美国总统任期内美拉关系的新变化。

（一）对美拉关系的总体判断

从美国与拉美国家发生外交关系起至今，美拉关系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时期：即从门罗宣言到“睦邻政策”（1823—1933）；从“睦邻政策”到古巴革命（1933—1959）；从古巴革命到“布什倡议”（1959—1990）；从“布什倡议”到现在（1990—目前）。对美拉关系的总体判断，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冲突与合作”，认为这是一根把美国政府各个时期对拉美的政策连贯起来的一条主线。但也有学者提出，美国是巨人，是霸主，而拉美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势单力薄，因而将美拉关系以“冲突与合作”的标题并列起来，“似乎不大合卯”。⁵有学者指出，美国对拉美政策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就是独霸拉美。⁶还有学者对美国拉美政策的实质进行了剖析，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性质和拉美地处西半球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要实现其在西半球建立和维护霸权地位的总目标。在独霸美洲的总目标下，又逐步派生出了三个长远目标：一是排除非美洲国家在西半球的势力和影响，尽最大力量防止这些国家对美洲事务的干涉；二是利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不遗余力地保持它在西半球的盟主地位。三是在保证即得利益的前提下，努力促进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拉美国家的依附性经济。这三个长远目标在实现过程

⁴ 本统计将关于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文章放在了“经济类”，而没有放在“国际关系类”。

⁵ 杨生茂：《一本富有启迪效益和卓异见地的好书——〈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考察〉读后感》，《拉丁美洲研究》1995 年第 5 期。

⁶ 张文峰：《从门罗宣言到“睦邻政策”——兼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中相辅相成，互相作用，使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⁷

学者们对美国的干涉政策给予了揭露。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内的“大棒政策”和继任总统塔夫脱1909—1913年任内的“金元外交”，是美国干涉政策最集中的反映⁸。徐世澄先生主编的《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一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对拉美侵略和干涉的事实分三个阶段做了介绍：即第一阶段（战后至50年代末）美国对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干涉和颠覆；第二阶段（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对智利阿连德政权的颠覆、对格林纳达的武装入侵、对巴拿马的武装入侵、对中美洲冲突的干涉、对古巴的长期封锁与强权政治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的罪恶活动；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为特点的新霸权主义。作者对所有这些侵略和干涉的事件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和深刻的揭露，并指出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拉美多数国家的关系有所改善，但美拉之间并没有真正建立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时有表现，美拉之间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⁹

有学者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的文化外交活动，认为这一“实验”取得了成功，为美国政府在战时和战后把文化外交扩大到其他地区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¹⁰该学者还对“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化”进行了辨析，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主要涉及美国利用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而“美国化”不是靠外部施加的压力所推动，很大程度上是（拉美）国家内部对美国文化进入的一种主动的甚至积极的反应。这是与通过外部压力把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另一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做法的主要区别所在。因此，尽管二战后拉丁美洲是美国文化产品“泛滥”的重灾区，但不能完全冠以“文化帝国主义”¹¹。

（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美拉关系

卡特总统（1977.1—1981.1）时期。卡特上台时，拉美反独裁斗争高涨，美国战后一直奉行的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的政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也正处于战略收缩期。为改变美国实行“遏制”政策的传统形象，卡特任期内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实行所谓“人权外交”，即通过经济手段来迫使独裁政权减少镇压，缓和各国国内矛盾，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卡特提出，在向拉美国家提供军援时，应以它们改善人权状况为条件，否则停止援助。据此，美国先后中止了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军事援助。卡特政策的实质是利用美国在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念上的优势，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有学者认为，卡特的“人权外交”受到拉美的文人政权和持不同政见组织的欢迎，一开始也受到国会的支持¹²。但有学者认为，卡特的“人权外交”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非但没有保持西半球的“稳定”，反而丢失了一些地盘，恶化了美国与拉美一些军政权的关系，因而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¹³卡特在中美洲推行“人权外交”的结果是得罪了右派，未能扶起中间派，助长了左派，同时也恶化了中美洲国家同美国的关系。¹⁴

里根总统（1981.1—1989.1）时期。里根任内，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明确地又回到了美、苏“两极”世界的概念上来。重视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修改“人权外交”政

⁷ 王晓德：《试析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实质》，《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5期。

⁸ 安建国：《1826—1848年拉美国际关系之我见》，《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2期。

⁹ 文进：《以史为鉴，居安思危——评〈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一书》，《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4期。

¹⁰ 王晓德：《拉丁美洲与美国文化外交的起源》，《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3期。

¹¹ 王晓德：《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

¹² 贺松柏：《卡特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的政策》，《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5期。

¹³ 刘新民：《浅论美国对拉美的人权外交》，《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3期。

¹⁴ 毛相麟、李岩：《卡特政府以来美国对中美洲政策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6期。

策,改善与某些南美国家的关系,决心遏制苏、古扩张,加紧同苏联的争夺¹⁵。有学者认为,里根政府放弃了前一届政府的缓和战略,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总战略,并选择中美洲推行其“低烈度战争政策”¹⁶。里根政策的重心是中美洲,他的目标是,“就短期内我们必须消除古巴、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就长期来说,我们必须建立能顶住这种影响的政治上稳定的国家”。据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经济援助;支持萨尔瓦多政府镇压游击队;1983年10月武装入侵格林纳达;增加在中美洲的军事存在;推动中美洲有关国家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对尼加拉瓜施加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压力;并企图把中美洲和谈纳入美国的轨道。对里根政策的评价,有学者认为,里根政府的“进展”是大大加强了美国左右中美洲局势的能力。不过,总的来说,“选择余地恐怕越来越小了”。¹⁷但也有学者认为,里根的拉美政策“成绩平平,建树甚少”,其主要标志是他提出来的“发展同墨西哥的密切关系、维护加勒比海地区的安全和繁荣以及保卫南大西洋交通线”的三大目标不仅未能如期实现,美拉关系反因马岛事件而受到严重损害¹⁸。有的学者认为,“从局部和短期来看,取得一定成效,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遭到了失败。”¹⁹

老布什总统(1989.1—1993.1)时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任内,正是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随着这种转变,布什的拉美政策呈现为两个阶段。前段政策重点仍是国家安全,以人权和恢复民主为借口对中美洲国家采取了“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手段,1990年2月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在大选中战胜桑解阵。同时,不放弃武力,1989年12月军事入侵巴拿马,解决了里根未能解决的巴拿马问题²⁰。后段政策重点转向经济,1990年6月27日,布什宣布了“开创美洲事业倡议”(简称“美洲倡议”),表示美国要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关于“美洲倡议”,有学者认为,布什倡议的基点是要建立整个美洲的自由贸易区,但前提是拉美国家要按照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同时,要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的条件。该倡议的实质是要求拉美国家为美国商品“打开市场”,为美国在拉美的投资排除障碍。这是自1961年提出“争取进步联盟”以来,美国提出的又一个关于拉美的纲领性政策宣言,它表明美国对拉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²¹。还有学者认为,“美洲倡议”体现了美国的新价值观,是美国政府对后冷战时代认识的产物,因为布什认为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之间的长期比赛现在终于行将结束。它标志着美国对拉美政策的侧重点已经由政治、安全问题转向经济问题,并且是以贸易取代援助²²。但是,有学者认为,该倡议是美国新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纯经济性的倡议²³。还有学者认为,从构成美洲倡议三大支柱的债务、投资、贸易来看,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将是困难重重。美国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更多地是妥追求政治目标,即维持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稳定,消除拉美国家的失落感,加强对它们的控制。而不是为了与欧洲和日本抗衡的经济目标²⁴。说到倡议实现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美洲倡议”能够而且已经对美拉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尽管“倡议”的实施决非易如反掌,但其成功的可能性是不能被忽视的²⁵。也有学者表示,“将美洲自由贸易区这一构想

¹⁵ 曹琳、高文:《里根政府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动向》,《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1期。

¹⁶ 宋晓平、汤小棣:《从低烈度战争理论看80年代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3期。

¹⁷ 苏振兴:《评美国对中美洲的政策》,《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3期。

¹⁸ 安建国:《试论里根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拉丁美洲丛刊》1985年第1期。

¹⁹ 毛相麟、李岩:《卡特政府以来美国对中美洲政策的演变》,《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6期。

²⁰ 朱艳萍:《美国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5期。

²¹ 徐世澄:《评布什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2期。

²² 张宝宇:《体现美国新价值观的“开创美洲事业倡议”》,《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6期。

²³ 苏振兴:《从“美洲倡议”看美、拉关系的走向》,《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5期。

²⁴ 贺双荣:《布什的“美洲倡议”面临重重困难》,《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1期。

²⁵ 江时学:《关于美拉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3期。

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个过程的的确是相当艰难的²⁶。”

克林顿总统（1993.1—2001.1）时期。克林顿政府对拉美的政策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建立西半球“民主共同体”，二是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在总体上延续了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²⁷。在推动西半球贸易自由化和民主化方面，克林顿政府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向发生金融危机的墨西哥提供 530 亿美元的贷款，1994 年出兵“恢复”海地的民主，并主持召开了两次美洲国家首脑会议（1994 年克林顿邀请美洲 33 国领导人在迈阿密召开了首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规划；1998 年在智利圣地亚哥召开了第二届峰会。），等等。但有学者提出，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从未访问拉美，拉美是一个“受到忽视的灰姑娘”。在第二任期内，克林顿对拉美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同美国与欧洲、亚洲的关系相比，美拉关系在克林顿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仍处于次要地位。尽管如此，克林顿在第二任期内对拉美的频频出访会给美拉关系带来新的变化²⁸。有学者认为，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美拉之间虽仍会时有龃龉，但加强合作和谋求发展，仍是美拉关系的主导²⁹。

小布什总统（2001.1—2009.1）时期。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伊始，对拉美地区制定了系统而全面的外交政策，对拉美的重视程度也远远超过克林顿政府。布什曾许诺“重视发展美拉关系”，将 21 世纪变成“美洲的世纪”³⁰。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作了全面调整，将反恐列为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中东和中亚地区，美国对拉美的外交目标不得不让位于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需要。反恐也成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重点³¹。这种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带来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拉美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陷入僵局；拉美国国家更多地开展多元外交，自主性增强。因此，有学者认为，布什第二任政府将会重视对拉美的政策，其政策核心是“推广民主自由”，意在通过“民主输出”来结束拉美地区的“暴政”。但同时在经济上力促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尽早实现，在外交上，通过反恐、扫毒等手段来加强地区合作，进而实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³²。有学者认为，布什上台后，美拉关系出现恶化，其原因不仅仅是布什政府因伊拉克战争而忽视拉美造成的，还有其他原因，如拉美国家的经济在“9.11”之后受到巨大冲击；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和左派崛起；美国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作为推行霸权的工具；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横加干涉，等等。尽管美拉关系不断恶化，但美拉关系的根基并没有受到动摇，美国不会失去拉美³³。

奥巴马总统（2009.1—2016.1）时期。奥巴马政府伊始，批评小布什的拉美政策为“失败的政策”。由于拉美左派政府的反美情绪、拉美国国家不断加强的团结与合作、大国在拉美日益扩大的存在，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重塑美国在美洲的领导地位”，建立“新的美洲联盟”。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包括增加对拉美的援助、与古巴和委内瑞拉进行直接对话等³⁴。有学者指出，2009 年 1 月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巧实力”和多边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由小布什执政时期奉行的激进的理想主义向务实的现实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奥巴马表示要与拉美国国家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缓和与委内瑞拉等敌对国的关系；在打击贩毒问题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在拉美提倡“民主治理”；经济政策的重点

²⁶ 苏振兴：《关于美洲自由贸易区若干问题的探讨》《拉丁美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²⁷ 徐世澄：《克林顿政府对拉美政策的走向》《拉丁美洲研究》1993 年第 6 期。

²⁸ 周余云：《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拉美政策的走向》，《拉丁美洲研究》1997 年第 5 期。

²⁹ 陈太荣：《浅析克林顿政府对拉美的外交政策》，《拉丁美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³⁰ 江时学：《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拉丁美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³¹ 吴志华：《美国在拉美的外交行动屡屡受挫》，《拉丁美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³² 齐丰田：《第二届布什政府对拉美的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³³ 贺双荣：《布什执政以来的美拉关系》《拉丁美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³⁴ 贺双荣：《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美拉关系的走向》，《拉丁美洲研究》2008 年第 6 期

也不再是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但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决心没变³⁵。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奥巴马政府拉美政策的重点放在非贸易领域，即禁毒、反恐、移民、能源、民主、反贫困、气候变化等问题上³⁶。有学者认为，2014年6月由斯诺登爆出的“棱镜门”事件对美拉关系造成冲击，尽管一些拉美国家对美国采取了高调批评姿态，但在具体行动上当时双方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201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终结，美国不再致力于干预其他美洲国家事务”。但也有迹象表明，美国正寻求将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拓展的机遇，以及以经促政的外交策略³⁷。

总之，从“门罗主义”诞生到克里宣布“门罗主义已经终结”，**学者们认为**，美拉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关系。美国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在该地区的霸权，美拉之间由此也出现了不断的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拉关系被纳入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虽然美国历届政府对拉美政策存在着差异，“但美国在拉美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前后一致的”，即“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亦即“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³⁸。但是，由于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发生的新变化，由于**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重点已不在拉美，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一直在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

二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

中拉关系是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新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研究》有关中拉关系的文章显著增加，**近14年来共发表71篇，占近14年国际关系文章总数的35.5%**，而此前的21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不足20篇。中拉关系涉及的主要问题是中拉关系的发展与现状、对中拉关系的总体判断、中拉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以及影响中拉关系的一些其他因素。

（一）中拉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拉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有学者将1949年到2009年60年的中拉关系划分为4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是以民间交往为主的“民间外交”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同拉美大多数国家实现建交、中拉关系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是中拉各领域友好合作取得长足发展的时期；进入21世纪时中拉关系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迅猛发展的崭新时期³⁹。

也有学者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拉关系的发展经历了5个阶段，即（1）民间交往阶段（1949—1969），其中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建交；（2）建交高潮阶段（1970—1977），中国与智利等11个拉美国家建交，其中包括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大国；（3）平等互利、共同发展阶段（1978—1992），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在巩固和扩大在拉美外交阵地的同时，开始重视与拉美发展经贸合作。到80年代末，中国共与17个拉美国家建交，中拉贸易额累计290亿美元；（4）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阶段（1993—2000），这个时期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已经达到19个，中拉贸易额累计达到585亿美元，中国在拉美的投资约10亿美元。（5）“跨越式”阶段（2001年至今），如果说前四个阶段是“累积式”发展阶段，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中拉关系的发展则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³⁵ 朱鸿博：《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再次回归——论奥巴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³⁶ 黄乐平：《试析自“门罗宣言”出台以来美国对拉美经济影响力的变迁》，《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6期。

³⁷ 吴国平：《变化中的拉美：选择与挑战——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形势评析》，《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1期。

³⁸ 苏振兴：《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国际新格局下的拉美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拉美研究在中国”课题组：《2007—2008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2期。

³⁹ 王俊生：《“中拉关系60年：回顾与思考”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

发展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双边关系正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官民并举的新局面。该阶段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达到了 21 个，截止 2008 年，中拉贸易额达到 1434 亿美元，中国已经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拉美的直接对外投资存量约 248 亿美元，占中国 FDI 累计存量的 14.6%⁴⁰。

关于中拉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学者补充，中拉之间的贸易额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仅为 7.36 亿美元，到 1999 年增加到了 82.78 亿美元。2001 年—2010 年，中拉双边贸易额由 149.4 亿美元增加到 1830.68 亿美元。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流量在 2010 年达到 105.38 亿美元，在该地区的投资存量上升到 438.76 亿美元⁴¹。还有学者指出，从 2000 年以来，中拉贸易增长实现了“三级跳”，2000 年为 126 亿美元，2007 年达到 1027 亿美元，2011 年达到 2414 亿美元。从 2000 年突破 100 亿美元到 2007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仅用了 7 年的时间，而此后突破 2000 亿美元仅用了 4 年的时间。2000—2012 年中拉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 28.7%。⁴² 另有学者补充，2012 年中拉贸易额突破 2500 亿美元大关，达到了 2612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6.8%。同年年底，中国在拉美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 682 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拉美和加勒比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同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了自贸协议，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开局良好⁴³。（但 2013 年中拉贸易额没有太大的增长，仅为 2617.5 亿美元，这是因为中拉经贸同步进入调整期所致。）

发展中拉关系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以来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带动了拉美的“中国热”和中国的“拉美热”持续升温，中拉个领域交往和合作正在全方位推进，有学者将这种“全方位推进”概括为：“高层交往日益密切，战略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互利共赢，务实合作取得新突破；人文交往日益扩大、合作内涵不断扩展；多边对话不断深入、国际合作取得新成效；合作论坛提上日程，整体合作呈现新局面”⁴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3 年 6 月和 2014 年先后两次访问拉美。中国已经把与巴西、墨西哥、智利、秘鲁、阿根廷、委内瑞拉等 6 国的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在最近一次的访问中，习主席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对拉政策主张，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提出打造“1+3+6”合作新框架⁴⁵。并宣布了促进中拉合作的一系列倡议和举措，其中包括 10 年内力争实现中拉贸易规模达到 5000 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 2500 亿美元的目标。拉美国家也对习主席的建议积极响应。未来 10 年，中拉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跨越期。

（二）对中拉关系的总体判断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对中拉关系的总体判断是，中拉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但在发展前景上有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中国和拉美同属于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遭受殖民奴役和掠夺的遭遇，有着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外来干涉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共同愿望，双方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同时具有一些合作的有利条件，其中包括一是中国和拉美幅员都很辽阔，资源都很丰富，市场都很广大，可以互通有无，互为补充；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技术各有特色，便于互相交流和合作；三是都在根据本国条件探索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各

⁴⁰ 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总结与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增刊 2。

⁴¹ 董国辉：《中国与拉美经贸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 6 月第 3 期。

⁴² 杨建民、张勇：《当前的中拉关系特点评析》，《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⁴³ 张昆生：《努力推动中拉关系在更高水平先前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6 期。

⁴⁴ 张昆生：《努力推动中拉关系在更高水平先前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6 期。

⁴⁵ “1”是一个规划，即《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3”是三大引擎，即贸易、投资、金融合作，“6”是六大领域，即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

自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可以相互借鉴；四是都为发展中国家，对对方的处境和困难比较容易理解；五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都愿意遵循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而不是损人利己，强加于人；六是都有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的真诚愿望。因此，发展中拉合作关系大有可为⁴⁶。但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拉美国家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共性是缺乏发展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尽管在经济上有互补性，但这种互补是原材料和少数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上的互补，是一种低层次的互补。拉美向来以发展同美国、西欧和本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为重点。在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时代，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因此，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拉关系尚难超出双方传统的对外关系格局⁴⁷。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受到台湾“银弹外交”的钳制；中国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国际经济的拓展能力有限；中拉相距遥远，往来不便；双方之间相互了解不够。只有双方克服上述4个障碍，中拉关系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⁴⁸。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标志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人看好中拉关系的发展。2008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其中指出，“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看待对拉关系，致力于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当时中拉关系的状况被定位为：“呈现全方位发展趋势，发展速度和水平都处于历史最好时期。”⁴⁹

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拥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拉美国家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战略合作伙伴。在经济上，拉美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市场，是某些重要资源的来源地，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文化方面，中拉之间的广泛交流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加强中国软实力外交也具有重要意义⁵⁰。有学者分析，当前中拉关系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由4种因素组成，第一，新兴国家地位上升，相互合作加强；第二，拉美国家作为中国合作伙伴的重要性提高；第三，拉美国家把中国崛起视为重要的发展机遇；第四，拉美的外交“多元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⁵¹。还有学者强调，“9.11”之后美国忙于反恐、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困扰，无暇顾及拉美。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拉美也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中国在发展，拉美也在发展，双方迫切要求合作，因此，这种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⁵²。还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进一步分析了中拉关系加强的原因，认为新世纪中拉贸易大幅度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3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人口众多和经济快速增长，而是因为在新世纪之交中国工业化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型，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的新阶段，由此导致了对铁矿石、铜、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⁵³。也就是说，中拉贸易额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双方经济的巨大互补性带来的。

总体判断应该是，中国和拉美已经成为彼此相互依赖的战略伙伴，中拉关系在朝着乐观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三）中拉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⁴⁶ 张虎生、徐世澄：《中国和拉丁美洲开展南南合作大有作为》，《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3期。

⁴⁷ 张宝宇：《浅谈中拉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1期。

⁴⁸ 张森根：《中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状和前景》，《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5期。

⁴⁹ 刘维广：《“从胡锦涛主席出访哥斯达黎加、古巴和秘鲁三国看中拉关系的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6期。

⁵⁰ 沈安：《关于中国未来对拉美外交战略的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4期

⁵¹ 苏振兴：《中拉关系如何面向未来》，《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

⁵² 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60年：总结与思考》，《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

⁵³ 杨建民、张勇：《当前的中拉关系特点评析》，《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

尽管中拉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贸易争端、投资风险、人文交流滞后、人才匮乏等方面。如有学者指出，巴西频繁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中巴贸易产品存在直接和间接竞争；中国作为巴西资源性产品的大“买家”而出现贸易不对称；中国对巴西的投资承诺受到怀疑；中巴贸易争端存有政治化倾向⁵⁴。中国和墨西哥之间也存在双边贸易失衡问题，贸易摩擦不断，墨方的反倾销频率高、覆盖面广、强度高，1993 年对原产地为中国的鞋子和鞋靴配件征收 165%—1105% 的反倾销税⁵⁵。有学者指出，中国与智利之间存在贸易结构不平衡；贸易与投资不平衡；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不平衡；人文交流落后于经贸发展等问题⁵⁶。有学者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问题⁵⁷。由于拉美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中拉产业结构上的竞争性，拉美地区的经济民族主义等原因，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工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纠纷也日益突出⁵⁸。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额度少、领域过于集中，合作程度低、难以形成合力，政府政策对企业的限制过多等⁵⁹。2011 年，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这两个“避税天堂”吸引了 510 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存量，占中国在拉美投资总额的 92.4%。这意味着，中国在拉美非“避税天堂”的投资仅为 42 亿美元⁶⁰。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内对有关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落后，跟不上中拉关系发展形势的需要⁶¹。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不少学者提出，中拉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互信，根据拉美不同类型的国家，与之建立战略对话机制；中方应该主动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加强在拉美的投资，加快调整对拉美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某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推动与更多的拉美国家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银行业要加快进入拉美的步伐；国内熟悉拉美事务的人才严重缺乏，要有战略性安排，加强人才储备和智库建设⁶²。要“合力培养人才，夯实中拉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⁶³。有学者认为，摩擦是积极的信号，因为只有交往频繁了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事实上，存在争执的产品数额很小，完全可以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公平合理原则，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进行充分的沟通加以解决⁶⁴。针对贸易摩擦、投资风险和合作领域不均衡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拉合作的动力机制应该由贸易、投资的双引擎向多领域、多层次扩展；应该全面推进中拉关系，使中拉合作的地域分布更为均衡化；应该让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成为促进中拉关系发展的润滑剂⁶⁵。有学者指出，“中国和拉美之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交流方面还应继续加强，合作的领域还应深化，合作的渠道还应拓宽⁶⁶。有学者提出，在发展中拉关系中，不仅应该重视拉美的资源和市场，还应该开发和利用拉美的“无形资源”，即现代化的经验教训⁶⁷。还有学者根据自己在拉美的工作经验，指出了中拉双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建议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对拉美的文化交流，促进拉美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同时吸收和借鉴拉美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中拉关系的发展

⁵⁴ 拉美所课题组：《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巴西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拉丁美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⁵⁵ 吴国平、岳云霞：《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其面临的问题》，《拉丁美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⁵⁶ 贺双荣：《中国与智利关系 40 年回顾》，《拉丁美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⁵⁷ 李福胜：《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国家风险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06 年第 6 期。

⁵⁸ 董国辉：《中国与拉美经贸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 6 月第 3 期。

⁵⁹ 田志、吴志峰：《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布局及合作战略》，《拉丁美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⁶⁰ 江时学：《中拉关系五问》，《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⁶¹ 洪国起、韩琦：《发展中拉关系与拉美史学科建设》，《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增刊 2。

⁶² 谌园庭：《拉美所召开“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座谈会》，《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⁶³ 张明德：《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再认识》，《拉丁美洲研究》2013 年第 5 期。

⁶⁴ 陈笃庆：《中巴建交 35 年的发展历程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⁶⁵ 王萍、王翠文：《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中拉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拉丁美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⁶⁶ 王伟光：《继续加强中拉之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⁶⁷ 韩琦：《中拉关系与重视拉美“无形资源”的开发》，《拉丁美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具有更稳固的基础⁶⁸。“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是造福于民的人心工程”。中拉关系中出现的某些不太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拉美人民对中国还缺乏深入了解所致。因此，我们“应不断拓展双方的文化交流渠道和合作领域，创新交流合作模式，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广泛的民间人士参与中国和拉美的文化交流中来，”以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⁶⁹

（四）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什么是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有学者认为，“美国因素”是指在美国超级大国的独特地位，以及美拉关系、美中关系各自的特殊性等多重背景下出现的，具体表现为美国对于中拉关系的发展始终保持一种戒备心态，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采取抵制、干扰或防范的政策⁷⁰。还有学者指出，所谓“美国因素”是指美国从其霸权主义出发，视拉美为自己的传统“后院”和势力范围，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思维和排斥的心态看待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认为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发展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和美拉之间的传统关系⁷¹。

美国总统门罗在19世纪初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从那以后，拉美逐渐被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拉美视为它的“后院”。尽管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在20世纪末就已经有了某种端倪，但真正突显是在21世纪初。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拉关系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拉美4国之后，美国对中拉关系的关注也随之加强。2005年4月美国国会西半球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格·诺列加作了题为“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的发言。根据诺列加的发言，有学者分析，美国首先把中国在拉美的活动看作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行为，例如寻求资源、世贸谈判；其次是将中国的动机看作主要受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例如减轻国际压力、孤立台湾，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等，并未将其看作主动扩大国际影响和势力的行为，也不包括意识形态对立和扩张的目的。布什政府“还未将中国视作在拉美的强有力对手，也不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行动是特别针对美国的有意扩张行动”⁷²。也有学者注意到，美国对中拉关系加强的看法，实际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威胁论，一种是机遇论。前者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行动是对美国利益和霸权的挑战。后者认为中国在拉美的行动仅限于拓展贸易和投资机会，美国大可不必反应过度。中国因素稳定了拉美经济的增长，等于扶了该地区经济一把。中国与拉美关系的加强对于美国是“好机会”。到目前为止，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行政部门对于中拉合作的目的、前景及其影响并无定论。尽管“威胁论”和“机遇论”观点对立，但持这两种观点的人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美国不能忽视、而是要注意中国在其“后院”的行动。⁷³

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认为中国与拉美的经济联系会对美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但普遍接受中国在西半球的存在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如何处理摆正中、美、拉三边关系，形成三边关系的良性互动很值得研究。有学者指出，三边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中小国家。因此，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明显大于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而美拉关系则比中拉关系更具有影响力。在三边关系中，美国的影响力处于重要地位，美国的政策显然会对中拉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中美关系具有影响世界格局的意义，而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

⁶⁸ 李北海：《关于加强中拉历史文化交流的几点想法》，《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1期。

⁶⁹ 蔡武：《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交流为中国和拉美关系奏响和谐乐章》《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

⁷⁰ 苏振兴：《中拉关系如何面向未来》，《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增刊2

⁷¹ 张明德：《对中拉关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的再认识》，《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

⁷² 朱鸿博：《近期中拉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⁷³ 魏红霞、杨志敏：《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从美国政策的角度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只具有地区意义⁷⁴。有学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对拉中关系至今仍具有“母体性”,由此规定了拉中关系的现实性⁷⁵。因此,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在三边关系的互动中仍将处于较重要的地位。

如何应对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有学者提出,应该增强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与对话,增进共识与合作;应该针对不同的拉美国家,制定不同的政策,促进中拉友好关系的发展;中、美、拉应该建立机制性的多边合作机构和组织,合作应对挑战。也有学者提出,美国在拉美的经贸关系由来已久,在开拓拉美市场和开发拉美资源时,中国应该与美国加强合作。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建立合资企业⁷⁶。发展中拉关系,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因素,要以新的思路看待美国因素,不仅要完善中拉战略目标,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增强中拉战略互信,扩大战略共识,也要加强中、美、拉三者的沟通与交流,建立三者的对话平台,实现“三赢”⁷⁷。

三 结语

本文通过《拉丁美洲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来透视中国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认知演变。仅从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研究的轨迹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在过去的35年中,中国学者对“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比较集中的关注点放在了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这是2000年之前关注的重点,二是中拉关系,这是2000年之后关注的重点。

第二,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性质、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针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对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力求实事求是地、客观真实地反映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发展,同时,又辩证地探讨和分析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症结所在,并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

第三,通过梳理中国学者对“美拉关系和中拉关系”的研究和认知,使我们对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句话简单的解释是“我们先发现自身之美,然后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有人将其引申到文化领域,解释为“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族应该相互尊重,共同维护,从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而我们认为,这句话也可以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即首先要创新和认同本国的发展道路,其次是要尊重和欣赏他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里有一个前提,即要有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第三是双方相互尊重、彼此欣赏、彼此关切,这里除了接触、交流、对话的前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恪守平等互利的原则;最后才能达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美拉关系中追求霸权目标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而中拉关系中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目标使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和希望!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教授)

⁷⁴ 朱鸿博:《中、美、拉三边关系互动与中国的拉美政策》《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4期。

⁷⁵ 张宝宇:《浅谈中拉关系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1期。

⁷⁶ 江时学:《中拉关系五问》,《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5期。

⁷⁷ 程洪、于燕:《试述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2001~2010年)》,《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5期。